

JINGJIXUE MINGJIA

经济学名家近作书系

JINZUO SHUXI

构筑市场经济的 基础结构

★ 吴敬琏 著 ★

GOUZHU SHICHANG
JINGJI DE
JICHU JIEGOU

中国经济出版社

经济学名家近作书系

构筑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

吴敬琏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责任编辑：师少林 杨 岗

构筑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

吴敬琏 著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渤海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10 印张 250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1—3000

ISBN 7—5017—3993—5/F·2863

定价：20.00 元

作者前言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采取“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方针，进行财税、金融、企业、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全面改革。于是，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后转轨时期”（经济体制转轨的后期）。这个时期改革的任务，是在以往改革长期滞后的重点领域打一场除旧布新的攻坚战，以期在本世纪内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行百里者半九十”。后转轨时期改革的任务重大艰巨。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中，我们不仅需要解决企业制度创新、抑制通货膨胀、肃贪反腐等多年来一直困扰我们的老问题，而且面临着现代公司营运、资本市场建设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等一系列新问题。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我国经济也面临着进入国际竞争的新挑战。面对着这种形势，我们不能不认真分析情况，探讨有关的经济理论，提出进一步的改革设想。

在最近四年中，我针对改革新阶段面临的问题发表过不少意见。现在选出其中27篇作品，辑成这本书，呈献给读者。希望我的一得之见有助于讨论的深入和有关问题的妥当解决。

吴敬琏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日

目 录

第一篇 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和总体设计	(1)
市场经济形成的当前情况和中期前景.....	(1)
对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设计	(34)
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推进”的改革战略	(44)
邓小平经济思想的战略意义	(57)
第二篇 企业改革	(69)
关于公司化	(69)
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公司化	(81)
大中型国有企业公司化的难点及对策.....	(103)
公司应否设立固定的“法定代表人”	(117)
放开放活小型国有企业.....	(125)
对诸城小企业改革经验的看法.....	(139)
第三篇 金融市场建设	(145)
我国证券市场的建设大计.....	(145)
我国金融市场形成的两个问题:	
金融抑制与经济气泡.....	(171)
第四篇 发展战略	(181)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	(181)
调整经济结构思路要对头.....	(192)
对迈向 21 世纪上海战略的若干想法	(200)
在市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大亚湾经济.....	(208)
如何确立西安的商贸中心地位.....	(217)
对武汉发展战略的意见.....	(225)
制定重庆发展战略的几个方针性问题.....	(230)

第五篇 反对腐败	(241)
反腐败必须釜底抽薪.....	(241)
《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再版前言	(247)
再谈根治腐败.....	(254)
第六篇 社会问题及其他	(263)
通货膨胀政策决不可行.....	(263)
贫富差距大小谈.....	(268)
也谈如何对待民工潮.....	(276)
经济改革与政治稳定.....	(288)
政府在转轨中的作用：中国经验.....	(303)

第一篇 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和总体设计

市场经济形成的当前情况和中期前景*

今天我的讲话题目是《市场经济形成的当前情况和中期前景》。在这个题目下，准备讲三个问题：一、中国的改革战略：成就和不足；二、为什么近来出现了新的经济不稳定；三、稳定经济的应急措施和根本出路。

一、中国的改革战略： 由此取得的成就和造成的不足

近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和大众传媒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评论忽高忽低，大起大落。在 1989 年的政治风波以后，西方舆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样样都不行，只要加上制裁措施，中国经济就会崩溃。但是中国并没有像这种观点所想的那样垮台，而是从 1990 年以后一天天的见好。1991 年后发展得非常好。于是国际舆论又转向认为中国的经济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之一，甚至很快就

* 本文根据作者 1993 年 9 月 13 日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作报告整理。记录稿原载《中共中央党校报告选》1993 年第 4 期。

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

1990年年末，一本权威性的政治经济杂志——英国的《经济学家》，发表过一篇长文，分析“亚洲的四个新小虎”的兴起，它所说的“四个新小虎”除了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外，还有一个中国，指的是中国的沿海地带。后来世界经济学界公认80年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国高居第三名。这样一来，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好，便成为90年代国际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开了不少学术讨论会议论这个问题。一种流行意见把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归因于中国改革采取了一种不同于独联体和东欧国家“休克疗法”和“大爆炸”的“渐进改革战略”。在我们国内也有一些人响应这种说法。例如，就有一种说法是：前一段的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原因是改革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所以，应当坚持“渐进的”或“新保守主义”的改革战略。直到现在我们有一些报刊还是认为中国改革搞得好，就是因为采取了渐进的办法；今后仍旧应当坚持这样的办法，慢慢来。

在我看来，把中国改革的优点归结为速度上的渐进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我们知道，东欧和独联体国家采取“休克疗法”，是在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苏东剧变、政权易手以后的事情。当时，经济完全陷于崩溃，因而不能不采取“休克疗法”这类激烈的措施，以便重组经济体系。虽然采用这种办法的功过究竟如何尚待历史发展作出最后的判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能拿它来同中国1978年以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的改革作对比。可以同中国改革作战略对比的，是东欧和苏联1989年以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的改革。说到这些国家当时的改革，那么它们倒真的是“渐进”的。像最早开始的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的改革莫不如此。他们改了一二十年，基本没有动摇旧体制的基本框架。正因为没有进行根本改革，国民经济在80年代初就陷入了危机，最终导致经济和政治的崩溃。如果说他们的改革不成功是因为改革在速度上是渐进的，而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也是

因为渐进，显然不合逻辑。而且，从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看，有些很成功的改革并不是进行得很慢的。比如我国农业中的经营单位由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转变为包产到户的家庭经营制度就是在 1980 年秋季到 1982 年秋季的两年时间内完成的。改革进行得相当快，恐怕不能说是渐进的。所以说渐进改革肯定比激进改革好，从我们的改革的历史事实也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在最近几年的国际讨论会上，我对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提出过另外一种看法。我认为，中国成功的改革战略，其特点不在于“渐进”，而在于“从体制外开始”。这就是说，中国采取了一个不首先盯住国有部门这个旧体制的主干部分打攻坚战，而是避开锋芒，首先在“体制外”展开的改革战略。回顾社会主义各国几十年的改革，有一个基本的难点，就是无法在从旧体制到新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维持经济体系的有效运转。我们知道，经济改革的实质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过渡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可是由于人是天天要吃饭的，经济体系一天也不能停止工作。在原有经济体系，特别是它的主干部分和领导力量即国有经济改造的过程中，它的运行不可能有效。这样一来，经济状况就趋于恶化，经济状况恶化反过来又不能支撑转轨的进行，于是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转陷于恶性循环之中，最后导致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崩溃。几乎进行改革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碰到了这个问题：当国有经济的改革迁延不决的时候，经济发生恶化，导致改革缺少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持力量，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东欧国家中，匈牙利算是改革进行得最好的国家。1968 年开始改革，开头的一个阶段搞得似乎很不错，人们称赞卡达尔善于采取渐进的办法绕过国内外的阻力推进改革。可是正因为原有的经济体制没有根本突破，到 1980 年年初经济就出现了不稳定。搞了好几次“稳定经济”计划，越稳定越糟，最后在 80 年代末走向经济崩溃。从政治上来说，任何国家总是有反对力量的，经济情况坏

时，反对力量就活跃，社会就不稳定，最后走向政治动乱。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家虽有自己的特点，情况与匈牙利大体类似。

我国 70 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也是从国有部门开始的。这类改革，例如有名的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在开始的一二年“调动”了经理人员和职工的积极性，取得了增产增收的效果，很快就推广到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 60%、上缴利税 70%，几乎囊括了全部大中型企业的 6000 多个国有企业。但是这些改革试点的效果缺乏持久性：一方面并没有形成经理人员有职有权，积极努力改善经营管理，争取在竞争中取胜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在行政约束减弱后没有形成市场约束，出现了乱发奖金、乱上基建项目等问题。在 1980 年发生了财政赤字急剧扩大，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这样的问题。于是就发生一场争论。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仅仅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不行，必须进行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变革，将它改造为商品经济。另一些理论家说，出现混乱的原因是你们主张削弱计划控制，强调了价值规律，所以应该否定建立商品经济这样的口号，回到计划经济去。这个争论在经济学上没有得到明确的结论，只是在政治上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口号的地位。既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有经济体制就不需要作大的变动。这样，在 1981—1983 年期间，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停顿了。这种情况和匈牙利 70 年代的情况相当类似：往前慢慢地走一步，出了问题再往后退一点，过两天再往前走一点。这种作法使匈牙利的经济渐渐陷入危机。在中国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上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当 1980 年国有经济的改革陷于困境、不知出路在哪里的时候，“东方不亮西方亮”，在国有经济以外的领域里找到了出路。首先的一个是农村改革。1980 年 9 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改善农村责任制的决定里，第一次正式明确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在这

个决定作出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便基本上被包产到户这种新体制取代了。从此开始农村经济繁荣，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城市的非国有经济也发展起来了，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率，一直高于国有经济增长率一倍以上。

以上是“从体制外到体制内”这个改革战略的第一个表现，即个人、集体、国家一起上，发展非国有经济。第二个表现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前面提到，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的过渡遇到一个基本困难，就是一体化的国内市场体系不是一天就能形成的，在它还没形成的时候，新体制就不能有效运转。针对这个困难，中国采取了一种很巧妙的办法，那就是对外开放，使部分国内经济跟很成熟的世界市场相对接。这样，一方面可以把国际市场的竞争引进来，另一方面通过对接与外国实行优势互补、资源交流，较充裕的劳动力附在别人的资本和产品上出口，换回我们的短线资源，如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发挥市场调节的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第三个表现，是把发展非国有经济和实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采取地区推进的办法，使市场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沿海地区在改革和发展上都有它自己的优势。第一，沿海地区过去是国防前哨，一般说来，国有经济比较薄弱。国有经济薄弱，就有比较大的余地来发展非国有经济。而且某些地方还有原来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底子，如江苏就在社队工业的底子上移花接木，发展起来。另外，沿海地带在对外开放上也有它的优势，和港澳地理上很接近，在外的华侨又多，这使他们同世界市场对接比较容易。于是这些地方就成为我们的改革试验基地。在这些地区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就使得这些先行地区、主要是沿海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这样就给我们的改革找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撑力量。

由于实行以上的“体制外先行”的措施，改革14年来，我们的增长的平均速度始终很快，达到每年9%左右，在世界上也是站在前列的，不像东欧。东欧改革开始的时候增长也快过几年，但

不久就不行了，发生下行的波动，每况愈下，直到经济和政治崩溃。我们在改革中也翻筋斗，常常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但是因为我们的改革有强大的经济和政治支撑力量，波动就比较容易克服。1988年经济上的波动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是相当严重的。从1988年9月发生抢购，当月的通货膨胀率如换算成年率大概在80%左右，可是只用了1年的时间，到了1989年的9月，当月的零售物价环比指数（即9月对8月的物价指数）已经降到0。而且由于改革取得了成效，人们得到了实惠，所以全国人民人心思改，走回头路的政治倾向也容易得到克服。特别是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之后，几个月间就汇成一个不可阻挡的改革热潮。

所以，从中国的历史看，我认为我们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是由于我们不胶着在国有经济的改革上，而在非国有部门另辟蹊径。国有经济效率不高，好像老牛拉破车。但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大拆大卸地改组搞国有经济，而是给破车加点润滑油，小修小补维持着。在它之外打造新车，新车可能是像乡镇企业这样的独轮车，也可能是合资企业那样的现代车辆。这些新发展起来的非国有经济能把经济支撑住。有这样的支撑力量就使改革变得不可逆转。

刚才我讲了“从体制外到体制内”改革战略的优点，它使中国的改革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这是不是说，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一直采取这种战略呢？我认为不是这样。我不同意有些经济学家的“坚持渐进改革”的主张。这是因为，“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做法虽然在改革开始时有它的有利方面，但也有它消极的不利的方面。如果我们不善于运用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不利的方面可能变成主要的方面。

这消极方面是什么呢？我们改革的目的是要使整个经济体制转轨，如果国有经济部门不改，整个经济体系很难在市场经济轨道上运转起来。而且由于国有经济在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中占统治地位，如果国有经济的改革不能取得突破，国有部门改革长期

迁延不决，就造成双重体制并存，出现所谓“摩擦很大，漏洞很多”的状态。这会在经济生活中导致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压力经常很大，而且不时爆发。

通货膨胀的确切含义是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涨。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通货膨胀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不平衡，大量货币追逐少量的商品。在存在双重体制、经济效益不高的情况下，只要一提高增长速度，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这是个铁的规律。原因是：一般说来增长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增加投入，另一个是提高效率。在双重体制并存，旧的体制已经被突破、新的体制又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效率不可能有大的提高，要提高增长速度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增加投入。而我们又没有什么闲置的资源可供投入：一方面，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人均的自然资源占有量却不多，连最丰富的自然资源，像煤炭，人均占有的量也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更不要说别的东西了。另一方面，经过劳动加工的财富，即国民财富积累也很少，叫做“底子薄”。所以，要大量地增加资源投入，便不大可能。可是，货币投入却大量增加。例如上速度的时候要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增拨流动资金。由于投资效率不高，增拨量也很大。可是，这些票子出去以后，没有足够对应的资源，如钢材、水泥、木材和消费品等等。大量的票子追逐少量的商品，结果物价总水平必然上涨。所以，每一次增长速度达到两位数，几个月后，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世界银行在1991年有一个计算（当然这是一种估计），认为中国在现有的体制和效率状况下，不致引起通货膨胀的最高增长速度（即所谓潜在的增长速度）是每年增长8%，超过了这个速度，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从前几年的情况看，这一估算是合理的。如果我们的改革不能够在国有经济这个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有所突破，那么这种通货膨胀波动就无法避免。

第二，腐败的蔓延。

从1978年以来，腐败现象猖獗已经出现过好几次高潮。第一

次是 70 年代末期。那时的说法是：“工农兵学商，一起来经商”，即党政军干部利用取得经商的垄断权利寻求私人的好处。第二次，是 80 年代中期，以利用价格双轨制牟利的“官倒”为特征。第三次是这两年有些人靠国家银行的低息贷款和倒卖国有土地发财。

前两次腐败活动猖獗的时候，社会上对于在我们的条件下为什么会产生严重腐败的现象有过热烈的讨论。占主导地位的是这样两种议论：一种是说，搞商品经济，一定会引导人们追求金钱，使各种腐败的现象蔓延开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允许这种丑恶现象存在，因此，决不可以搞商品经济，而应当回到计划经济去。第二种议论的理论的立脚点跟第一种是一样的，就是认为搞商品经济必然鼓励人人追求金钱，官员也是人，因而收贿赂，拿回扣等等都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不必大惊小怪。既然不搞商品经济，不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经济就搞不好，出现腐败现象也只能看作为现代化作出的必要的牺牲。就是自己不满意，也应该忍一忍。如果看不惯，多看看就看惯了。近来对腐败的议论又有兴起的势头。只不过现在保守思想的市场不大，因而面对群众对腐败的不满，流行的是后一种观点。例如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腐败经济”，“没有腐化，哪有现代化”等等。

我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是不对的，因为它们的理论的立脚点不对。说市场经济一定会导致腐败，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而且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情况看，也很难找到根据。当然，只要人有私心和贪欲，就会有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由实物经济变成货币经济，由于突破了实物数量的限制，的确会使人的贪欲扩大，但是，这种欲望能否成为现实，可并不一定。不说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就拿战后我们周边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事情很清楚：不是那些引入了市场经济的国家，而是保留着较多过去的殖民地或者封建社会残余的国家更腐败。我们周边国家中腐败最突出的一个是菲律宾。菲律宾在战后是亚洲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也是最有希望很快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可是，它的反封建革命和市场化的进程

很慢，土地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实现，由于象马科斯一类官僚和他们的亲属可以运用自己的特权谋私，结果腐败盛行，弄得经济衰败，民不聊生。相反，那些最快建立健全的市场秩序的国家，腐败的程度则相对比较低。从历史上说，什么时代最腐败呢？一般说来是原始市场经济的时代，在西欧即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重商主义时代有两个特点，一是市场发育很差，二是行政干预很强烈。例如，在17、18世纪时的西欧，设立公司制企业要有皇家的特许。政府让你设立你才能设立，而不是像在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那样，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注册设立公司。这样，建立公司就成为一种特权，有不少人，像英国的“南海泡沫公司”、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公司”都靠这种特权发财。又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采取包税制，把征税的权力一级一级包下去，直到承包商，这样就谈不上什么公平税负，而是腐败非常厉害。到19世纪市场秩序在西欧各国建立以后，情况就有了比较大的改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消除权力干预、建立市场平等竞争秩序的进程可以比较快，也可以比较慢，因此各个国家消除腐败、建立清明政府和健全市场秩序的进程也会有很大区别。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腐败是跟权力有关的，是由权力干预经济生活产生的。在80年代中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对腐败蔓延的原因作一个科学的解释。“官倒”搞得这么严重，它的根源可以用现代的西方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也就是“寻求租金的理论”来解释。租金(rent)这个词在经济学里原来用来指从土地等供给不可能无限增加的生产要素得到的收入。租金是怎么来的呢？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和其他学派经济学家的解释是很接近的。按马克思的说法，地租的来源是垄断：绝对地租来源于土地所有权垄断，级差地租来源于土地的经营权垄断。在竞争性的市场里，超额利润不可能长期保持，因为某个行业赚钱多，大家都来干这个行业，它的利润就会降下来。可是，有垄断存在这种情况却不会发生，因为只

许他干不许别人干，所以，超额利润就能长期保持。在土地经营上，因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垄断，超额利润就得以保持，形成地租。战后，有些人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行政干预，如出口许可证，另外一些经济学家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干预，如美国的行政规制时，发现行政权力可以起同样的作用。权力可以造成一种垄断，能够创造出一部分租金。不过，地租是由经济权力造成的垄断产生的，而后一种租金却是由行政权力造成的垄断产生的。所以，可以用后一种“租金”来解释腐败的根源，腐败的本质就是对这种租金的寻求，即“寻租”。根据这种理解，我们可以把靠公共权力取得私人物质利益的行为称作“寻租行为”。权力既然可以给人以租金，于是，有些人就出钱寻求这个权力。在我们的生活中的送红包、给贿赂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为寻租付出的代价叫做“寻租成本”。一位在世界银行当过副行长的经济学家安·克鲁格 1973 年写过一篇很出名的文章叫《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她在文章里计算了土耳其和印度的寻租情况。当时这两个国家是有名的腐败国家。据克鲁格计算，土耳其租金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7% 多，印度还要高一些。在 1988 年我担任主编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的讨论中，多数人认为，用寻租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情况是很贴切的。这是因为，在我们的经济体制双轨并存的情况下，行政权力和交易活动搅在一起，有很多能够靠权力攫取社会财富的漏洞。双轨并存在 80 年代中期的突出表现是价格“双轨制”，即各种商品都有两个价格，一个价格是市场价格，另一个价格是调拨价格。两种价格的差距很大。谁能够用低价搞到调拨物资，再用高价在市场上卖出，谁就肯定能赚大钱。后来发展到不需要买卖商品，只需要买卖权力的表征：批文、许可证、外汇额度……，就能赚大钱。当时，每吨钢材调拨价 800 元，市场价 1800 元，所以买卖 1 吨的钢材就可以赚到 1000 元，1 吨钢材的批文可以卖几百元。这就是当时为什么官倒横行，聚敛了大量财富，弄得民怨沸腾的原因。到了 90 年代初期，官价和市场价靠拢了，才

没有多少人去倒了。1988年中宣部有一位名叫胡和立的年轻的同志算过一下：1987年和1988年商品的差价，加上汇率的差价和利率的差价占到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0%—40%。当然，这个差价并不完全是到了私人的腰包里，因为，调拨的物资、许可证有的时候是公对公的。但是，它的数量是这样大，哪怕有一部分落到了私人腰包里，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大量寻租可能性的存在，对整个干部队伍起了腐化作用。这里涉及一个概念，叫做“寻租成本”，也就是为了寻求权力作靠山付出的那些红包和贿赂等等。根据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寻租成本的最高限就是租金总量。因为只要寻租成本小于租金总量，寻租者就有赚头。弄清楚了这个道理，我们社会中某些难于理解的现象，也就很好解释了。例如，茅台酒还在好多年以前就已经卖到好几百元一瓶。人们感到很奇怪，茅台酒虽然比较好喝，也不至于珍贵到那个程度。其实茅台酒在当时有一个特殊的使用价值，就是作寻租的敲门砖。哪怕拿两瓶茅台送礼，换到一吨钢材的批条，也是划得来的。既然租金的总量这么大，我们的干部队伍就处在糖衣炮弹的包围之中、轰击之下。我们应当承认，除了极少数绝对坚定的人，绝大多数人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这样就比较麻烦了。一方面，行政干预无所不在；另一方面，有大量的寻租者想用钱来换权，整个社会有几百亿、上千亿的钱可以用来敲门。在这种情况下，腐败的蔓延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毛主席在“三反五反”时说干部贪污腐败是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我们在1956年就把资产阶级搞掉了。现在，糖衣炮弹不是资产阶级打来的，而是由于从旧体制到新体制的转轨不够快，由双轨制长期延续造成的。

第三，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社会集团之间收入水平差别扩大。

在采取“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改革战略的情况下，对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成份采取不同的政策，市场化的进度也不同，造